



中原学术文库·文集

马世之学术文集

马世之 著



大象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学术文库·文集

马世之学术文集

马世之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自序

我于1937年12月3日出生在河南省温县张寺村的一个农家,虽然成分被定为“中农”,实际上家境极其贫寒。温县虽系豫北小县,但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史称其控扼三晋云山,容纳百川烟水。太行环其后,长河带其前。南引巩洛,西挟泾渭,东接淮泗,车马辐辏,舳舻千里,风帆上下,百货阜通,素有“天下名都”之美誉。被称为“三魏逵道”,是河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就是在此文赋纷华之地读完小学的。中学时期,我似在演《三国演义》,先后在温县一中、杞县中学、开封二中完成学业,也就是说周游了历史上温、杞、魏三个国家。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被录取到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北大学为全国十四所综合大学之一,是一个“百年老店”,前身为“西北联大”,历史考古是其重点学科。西安古称长安,是周、秦、汉、唐故都,全国著名考古学家云集于此,陈直、石兴邦、金学山、郭宝钧、王仲殊、马得志、张长寿、陈梦家诸先生为学生讲课,老师们的辛勤教诲,使我终生难忘,铺就了我的人生之路。

1960年8月,西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陈列部工作。我在馆内除参加周、秦、汉、唐历史文物陈列外,还同何汉南一起参加郑(国)白(公)渠的考古调查,加上以前在长武下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算是已经迈进了神圣的“考古”殿堂。陕西省博物馆历史悠久,前身为西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武伯纶、陈列部主任何正璜,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于1961年发表了处女作《说秦》,刊登在《西安晚报》上,曾在馆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年,我被评为“陕西省文化系统五好青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

荣誉称号,为此感到无比荣幸。

1964年9月,我从陕西调回河南。新的工作单位是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立即被分配到新郑工作站参加郑韩故城考古,一干就是十四五年。在新郑参加钻探发掘的还有安金槐、许顺湛、郝本性、杨育彬、任常中等人,他们都是学界精英,后来均成为河南文物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因而向有“新郑工作站出领导”的说法。在这里,经过我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终于弄清了郑韩故城的规模及布局、韩国地下冷藏遗址、李家楼郑国墓地、后端湾郑国墓地、仓城西郑国墓地、烈江坡春秋战国墓地、大吴楼铸铜作坊遗址、仓城铸铁作坊遗址、白庙范铜兵器窖藏坑等,出土大批珍贵文物。1974年秋,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来新郑参观访问时,盛赞我们正在进行钻探、发掘的郑韩故城堪同意大利罗马古城相媲美。事隔多年之后,2008年3月1日,《东方今报》以《战国“王室冰箱之谜”》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当年我在郑韩故城考古发掘的某些情况,我为郑韩故城倾注了大量心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青春。1981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我所写的《郑韩故城》一书,被郑州市人民政府列为“我爱中华”的必读书目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郭建邦、张长森、黄世斌等人参加焦枝铁路河南段的考古工作。不久,被下放到温县、修武等地农村。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方才返回郑州,继续到新郑参加考古钻探发掘工作。当时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早已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由于新组建了《中原文物》编辑部,我被从新郑调回编辑部,同时还参与河南历史文物的陈列工作。其间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念念不忘学术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先秦城址。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关于春秋战国的探讨》《略论城的起源》《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试析》《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再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楚城试探》《关于西周都城遗址的探索》《试论城的出现及其防御职能》《略论楚王城》《试论商代的城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的象天问题》《玄象与中国古代都城设计》《关于史前城址的规模与人口问题》《略论洛阳东周王城》等,不下数十篇。日本考古学博士太田阿佐子女士专程来郑拜访,将《关于春秋战国的探讨》等论文拿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俄罗斯远东大学的库里娜·伊里金娜女士也将《郑韩故城》一书译成俄文,拟在俄国出版。有些文章被一些大学考古专业选入教材或指定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篇章,因而颇受学界重视。焦性德曾在1988年第3期《中州

城市研究》上撰写《笔走龙蛇写千城——记古代城市专家马世之》，赵立在1990年第3期《中原城市春秋》上发表署名文章《胸中自有百城烟水——访城市考古学家马世之》等，给予我在先秦古城研究上以很高的评价。

我在河南省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工作期间，曾任陈列部副主任、主任。从1983年开始，任副馆长兼《中原文物》主编。馆长许顺湛，是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我除了协助他做好馆务工作外，在学术研究上也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我所参与编著的《河南省博物馆》，先后由日本讲谈社和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于工作关系，曾经结识了许多国外著名学者，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杜樸、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宝拉·德马特、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杜特兰、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东京大学教授小川幸代、鸟取大学教授平势隆郎、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谷口满等，在许多问题上进行广泛交流，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

1989年1月，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胡思庸教授之邀，从博物馆调来社科院专职从事历史考古研究工作。1993年10月，任考古学研究员；1996年1月至1999年6月，任考古研究所所长。2000年，被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聘为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顾问等。在此期间，除对先秦城址继续探讨外，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到中原古国、文明起源、伏羲文化、楚文化及姓氏文化等各个层面。除发表一批重要论文外，先后出版《史前文化研究》《中原楚文化研究》《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中国史前古城》四部专著。《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出版于1998年，这是第一部全面探讨中原地区先秦古国的著作，出版后被赞为“重构古国历史，再铸中原文明”。

1992年，《史前文化研究》出版不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民族史学家、楚学泰斗张正明教授正在筹备《楚学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邀请全国著名学者撰稿，我也名列其中，给我约的书名为《楚文化的北渐》，当场就被我回绝了。我说：“这样的书名我不能接受。楚族与楚文化起源于中原，对江汉地区来说，是中原文化的南下，不存在北渐问题。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张先生看我讲得有理，就依我的意见，将书名改为《中原楚文化研究》，1995年，该书正式出

版。这是当代河南籍学者出版的第一部楚学专著。迄今为止,仅此一部。我在书中最早提出了“中原楚文化”的概念,现已被学界普遍认同。

撰写《中国史前古城》时,我已退休。当时《华中建筑》主编高介华教授编辑《中国建筑文库》,向全国知名专家约稿,我也名列其中。此书根据考古资料,对于我国中原、海岱、江汉、江浙、巴蜀、河套地区发现的64座史前城址进行全面梳理。并按地域和时代加以整合,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综合研究。该书外审专家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教授,从他那里顺利过关后,于2003年出版,颇受学界青睐。有的学者指出:“本书在史前古城研究方面,写下了浓妆重抹的一笔,是一枝独秀的奇葩。”或谓:“是考古学界近几年最高的史前城址著作,不仅在资料上集大成,在研究水平上也是高于诸位时贤。”

在“八五”至“十一五”期间,我除发表约300篇学术文章外,主持和参与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有《中原古国研究》《楚学文库》《黄河文化史》《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中原文化通史》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的著作和论文先后获奖20余项,除《河南省博物馆》《中原楚文化研究》《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中国史前古城》先后荣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外,《源于河南之姓氏》于1999年荣获昆明世博会金奖,《楚文化研究的新突破》于1996年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2016年3月24日,我因在黄帝故里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荣获郑州市委与郑州市政府颁发的特殊贡献奖。

20世纪末,中华民族史研究会将我列为当代国内外最有影响的百名历史考古学家之一。目前,我以耄耋之年,撰写的《中原之城——河南先秦城址研究》书稿,已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列为“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拟于近期出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的人生之路坎坷曲折,学术生涯十分艰辛,连年运交华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因为反对江青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冠以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仅遭到无数次批斗,而且下放农村劳动。我所受到的屈辱无以言表,终日除“请罪”外,便是以泪洗面。在那种悲惨世界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是我所遭受的第一次劫难。第二次劫难始于2011年7月,一个偶然机会检查出我罹患肝癌,虽然四处求医,仍不见显著

疗效。目前已经超越了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期,不久前又有大夫给我划定了一条两个月时间的死亡线,为我的生活涂上了一丝极其悲怆凄楚的色彩,我在闭门写作的同时,还得应对“肿瘤君”的侵袭,使我常有“人命危浅”之憾!

时至今日,好运又来。新一届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魏一明、张占仓、袁凯声诸公,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工作,决定出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资深专家文集。我就在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出49篇,集结成册,以飨学林。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不一,前后相差数十年之久。由于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发现,有些观点可能前后不尽一致,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这次收入时并未进行修订。尽管文集所收的文章并不理想,更不能全面反映本人的学术思想和理念,但敝帚自珍,愿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西北大学和中原智库、河南省最高社科综合研究机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马世之

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家属院寓中

2016年12月30日

目 录

古城古国研究

- 002 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 013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的“象天”问题
- 023 试论城的出现及其防御职能
- 031 试论商代的城址
- 040 关于西周都城遗址的探索
- 049 虞舜的王都与帝都
- 056 古城寨城址与祝融之墟问题探索
- 062 登封王城岗城址与禹都阳城
- 071 新砦城址与启都夏邑问题探索
- 080 考古视野下的二里头遗址
- 088 望京楼城址探索
- 094 娘娘寨城址与郑国东迁问题探索
- 102 略论洛阳东周王城
- 111 骊山与崇山
- 118 涂山地望考辨
- 123 夏代葛国地望浅析
- 127 文王伐崇考
——兼论崇的地望问题

文明起源研究

- 142 试论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与文明
- 151 西山城址与河洛文明
- 159 黄河流域文明起源问题初探
- 168 “覃怀底绩”与黄河文明
- 174 中外文明起源问题对比研究

伏羲文化研究

- 188 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
- 200 华胥氏与伏羲女娲
- 206 浅议羲皇故里
——兼析女娲文化的发祥地
- 215 中原地区的伏羲文化
- 230 黄土高原地带的伏羲文化

炎黄文化研究

- 240 试析炎黄文化的发祥地
- 254 有蟠氏故里及其相关问题
- 261 具茨山黄帝文化试析
- 267 嫫祖与嫫祖故里
- 276 从两河流域到溱洧之滨
——黄帝族的发祥地研究

颛顼文化研究

- 286 颛顼与龙
- 294 颛顼与帝丘
- 300 颛顼活动地域地理新证

楚文化研究

- 310 关于楚族的族源及其发祥地
- 317 楚都丹阳地望探论
- 334 略论楚郢都城市人口问题
- 343 关于楚之别都
- 353 试论楚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关系
- 361 楚东迁问题试析

姓氏文化研究

- 374 中华姓氏与姓氏始祖黄帝
- 381 怀川文明与温姓之源
- 389 叶姓祖地在叶县
- 393 宁氏族源在获嘉
- 396 蔡姓祖地在上蔡
- 403 柳姓之源在濮阳
- 408 从芒砀山“天子气”“斩蛇碑”看汉代刘姓的发展

附录：马世之著作存目

古城古国研究

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行将结束,新的文明时代就要来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做过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由此可知,城这种大规模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问题上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加以初步探讨。

我国早期城的形制

据历史文献记载,城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甚早。《汉书·食货志》引晁错的话:“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造五邑。”《汉书·郊祀志》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提及人皇之世:“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管子·轻重戊》曰:“夏人之王……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世本·作篇》说:“鯀作城郭。”《世本》张澍补注转引《吴越春秋》:“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鯀作城。”又说:“鯀以兽尾为城。”《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认为:“共工氏所发明,鯀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鯀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作护庄堤。因

为共工氏不过防它自己氏族的淹没,所筑有限,鲧却是为各部落所推,大规模地工作,所以创作城郭的荣誉不正确地归于他。”《礼记·礼运》则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我们姑且不论谁是最先发明城郭的人,因为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历史难题。但是,不管神农、黄帝也好,共工、鲧、禹也罢,他们所处之世可能与“大道既隐”的时代相距不远,约在原始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产生这一历史阶段。从考古发现来看,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关于城的概念,《说文》云:“城以盛民也。”《释名》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可见它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其主要标志是城墙。据《营造法式》讲,墙有五种称呼,一曰墙,二曰墉,三曰垣,四曰壕,五曰壁。一般均以城墙或城垣名之。杨宽先生主张沟的产生应是城的萌芽。他在日本看到的古城,四周有沟,却没有围墙。^[1]沟的作用与墙相同,“半坡、姜寨居住区外围都设有宽、深各5—6米的壕堑拦护。这一防御性设施,兼作雨水的排放沟。堑壁较陡峭,相对堑底而言,它实际上是一座相当高的围墙。在发明夯筑技术之前,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设施。正如同源于穴居的建筑发展是从建筑材料的削减开始一样,筑城的历史也是从它的对立面发生的”^[2]。在一些仰韶时期村落遗址的周围,不仅发现过人工挖掘的围沟,围沟内侧还设有栅栏,当时的栅栏与围沟可以被视作城池的萌芽,或者说是出现城的征兆。氏族社会晚期,在填平坑洼或垫高建筑地基时以脚踏平、践实的经验基础上而发明了夯筑技术。由于分层夯筑,从而使土壤紧密、坚实,提高了它的强度。山东日照东海峪大汶口文化建筑遗址的台基、护坡及居住面,均系分层夯筑而成,并发现用天然石块夯筑时留下的夯窝,开后世夯筑技术之先河。^[3]由于战争的频繁和武器(特别是弓箭)射程的提高,使得原始壕沟的防御功能不能适应。加之夯筑技术的发展,城垣这种突起的障碍便应运而生,人们从而创造出一套筑城工艺。^[4]迄今所知,我国发现西周以前的早期城址为数不多,试举例分述如下:

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 该城址位于山东章丘(旧属历城县)龙山镇以东的武原河畔,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现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50米,东西长约390米,遗留在地面的残垣高2.1—3米,宽约10米。它是由黄土掺料礓石夯筑而成的。夯层厚12—14厘米,圆形夯窝,径3—4厘米,利用版筑法筑成。“此墙当为黑陶时期(即遗留下层遗物)之城子崖居民所建筑,并且

他们在城子崖居住了相当时间后才开始建筑的。……这里的堆积情形无疑地指示出墙之建筑时代”^[5]。所谓“黑陶时期”，即龙山文化时代。至于城墙与龙山文化遗存的关系，“就地下包含物的分配情形而论，黑陶期（即龙山期）人民是在全址上，东一家西一家，散乱地居着。……黑陶人民（即龙山人民）在此居住了许多年之后，才绕其居住之周围筑了城墙。墙形不甚规则，但它的根基即划出城子崖文化遗存的范围。其外即少见人住之痕迹”^[6]。可见城子崖城址应属龙山文化时期的防御设施。

安阳后岗龙山文化城址 该城址坐落在河南安阳洹水之滨的高岗上，是继城子崖后发现的又一座古城址。该城址的周围遗留有版筑围墙，其中的一段宽2—4米，长70余米，“它恰恰地围绕着这高岗上的龙山文化遗址；在墙土里面我们只见到了仰韶文化遗物，从不见有龙山式遗物。这证明在龙山文化的人们刚来此地居住时，即在仰韶文化的废墟上建筑起自己村落的围墙”^[7]。“村”与“城”的重要分界线之一便是围墙。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8]用墙壁防守起来的后岗村落，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城邑。

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 该城址位于河南登封告成镇西约1千米的王城岗上，坐落在嵩山南麓的颍水和五渡河交汇处。1977年在这里发现部分城墙的基础槽。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中间有一堵南北走向的城垣，将它分作东、西二城。东城的西垣南段残长65米，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南垣与西垣垂直以约90°的角度相交，东城的平面原来可能是正方形。西城南垣长82.4米，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约29米。整个城址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基础槽内残留的夯土层厚度为10—20厘米，也有厚6—8厘米的。夯痕的形制大小不一，有圆口圜底、椭圆形圜底和不规则形数种。^[9]根据基础槽内夯土层中出土的木炭测定，其年代距今 4010 ± 85 年，树轮校正为 4415 ± 140 年。^[10]因而此时代约为龙山文化中晚期。

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 该城址位于河南淮阳县城东南4千米的大朱庄西南，坐落在蔡河西岸高出地面3—5米的台地上，是1979年发现的。遗留在地面上的夯土城垣残高3米多，上宽8—10米，下宽13米。夯层厚15—20厘米。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内面积约43000平方米，连同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0000余平方米。南北城垣的中段，各发现一个城门，在

南城门外东西两侧分别设有门卫房。南门门道路土以下 0.3 米处,铺设有三条陶水管道。该城址共分五期文化,城垣建筑属于第二期。据三期灰坑(H15)出土的木炭进行碳十四测定的年代,距今 3960 ± 140 年,树轮校正距今 4355 ± 100 年。该城址的时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由于这座城堡的发现,证明了距今四千三百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已知道构筑用于防御的工事。”^[11]

偃师商代城址 该城址位于河南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一带,是 1983 年夏季发现的。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宽约 1200 米,南北长约 1700 米,除南垣被洛河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基本完整,已知西、北、东垣的长度分别为 1710 米、1240 米、1640 米。城墙系夯筑而成,一般宽度为 16—25 米不等,残高 1—2 米。城墙缺口共有四处,其中北垣西段上的缺口为城门遗迹。城内发现四处大型建筑基址,南部正中的 1 号建筑基址是一处四面设有夯土围墙的大型建筑群。另外,也找到两条大道,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在城的东垣外侧,还探到一处大型水池遗迹。这座城址很可能是商汤当年所建的都城“西亳”^[12]。

夏县东下冯城址 该城址位于山西夏县埝掌公社东下冯村东稍偏北,坐落在青龙河南岸的台地上,是 1976—1979 年间发现的。城墙为夯土筑成,全部埋于地下,仅钻探出城的南垣及西垣。南垣长约 400 米,它的走向是:从东南拐角西行 200 米,然后向南拐出 60 米,又折向西 140 米与西垣相接。城墙宽约 8 米,残高 1.8 米,夯土紧密坚硬,夯层厚约 10 厘米,夯窝直径 5—7 厘米。“从地层关系和斜夯土中的出土物来看,夯土墙的时代约为商代前期。”^[13]

郑州商代城址 该城址位于河南郑州市区内偏东部,是 1955 年秋发现的。它的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垣、南垣各长 1700 米,西垣长 1870 米,北垣长 1690 米,周长 6960 米。保留在地面上的城墙残高 1—9 米,宽 20 米左右,夯层厚 5—10 厘米,夯窝有圆形圜底、圆形尖底或不规则形多种,夯窝深 1—2 厘米,径 2—4 厘米。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基址。“郑州夯土城墙属于商代是确凿无疑,它建造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其使用时间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开始,一直沿用到二里岗期上层。”^[14]

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 该城址位于湖北武汉市北 5 千米的黄陂县滠口公社叶店大队境内,南靠流注长江的府河,北面一带是小土岗,东北面为盘龙湖。它的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 290 米,东西长 260 米。城垣残高 1—3 米,由夯筑而成。夯层厚 8—10 厘米。城垣外还有宽约 10 米的壕沟。相传城垣四面中间都

有一个缺口,这些缺口可能为城门遗迹。城内东北部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判断,“到二里岗期上层时,商文化的居民把这里建为一个重要的居住地,先后建筑过上、下两层大型建筑群,古城的城垣是和上层宫殿建筑群同时营建的。这种营建的顺序关系,既说明了古城是中途才形成的,又进而表示出它是属于保卫宫殿的宫城的性质”^[15]。由此可知,黄陂盘龙城属于商代二里岗期的建筑遗存。

上蔡周代蔡国城址 该城址位于河南上蔡县城关周围,坐落在芦岗的东坡。汝河沿岗的西坡向南流去,至今还可以看到汝河故道。洪河从岗北折向东南,由故城东面向南流去,形成了黄陵陂和蔡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垣长 2700 米,东垣长 2490 米,北垣长 2113 米,西垣长 3187 米,周长 10490 米;保留在地面上的城墙残高 4—11 米,宽 15—25 米。城垣由夯筑而成,夯层厚 8—14 厘米,夯痕为小窝圆底,径 2—3 厘米。城墙缺口甚多,其中有 4 处可能为城门遗迹。城外挖有城壕,城内中部的二郎台可能是宫殿区所在。根据城墙内所包含的遗物推断,可知“该城始筑于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进行过加固和修复”^[16]。

曲阜周代鲁国城址 该城址位于山东曲阜县城关一带,坐落在洙、沂二水之间。洙河绕于城的西、北两面,小沂河流经城南。城的东面是丘陵山岳,西北和西南是一片辽阔的原野。城址平面略呈扁方形,保留在地面上的城墙残高 10 米上下。东垣长 2531 米,南垣长 3250 米,西垣长 2430 米,北垣长 3520 米。城垣周长 11731 米。城外有护城河,发现城门遗迹 11 处。“曲阜鲁故城是我国目前经过系统钻探的一座西周城,而且是一个贯穿两周始终的国都。”^[17]

除前面提到的这些古城外,还有安阳殷墟、长安丰镐遗址、洛阳西周王城等,均未发现城垣遗存。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范围估计在 24 平方千米以上。解放以后,在小屯村附近宫殿遗址中心以西约 200 米的地方,发现一条巨大的晚商壕沟,已勘查出长 750 米的一段,宽 7—21 米,深 5—10 米,由西南蜿蜒向东北,与洹水弯曲构成一种环形防御设施。^[18]《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唐代魏王泰等人所撰《括地志》云:“……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可见殷墟原来有城,唐代尚能看到城垣遗存。迄今为止,虽然没有在这里发现有关城垣的迹象,但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𠩺、𠩻、𠩼等字是城楼和城垣的形象,可知商代后期城的形制也是方形。

陕西长安是西周王都丰、镐所在。《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毛诗》郑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周文王灭崇着后营建丰京,时当公元前1133年。丰京在今长安县沔河以西的客省庄、张家坡、马王村一带;镐京在今长安县沔河以东、阿房宫村以南、斗门镇以北的普渡村一带。沔河两岸尚未发现城垣遗存,我们对丰、镐二城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据说这里所指的就是丰、镐的建制,因而丰、镐二京在规划上应为方形。

河南洛阳是西周的东都,东周的王都。它西依秦岭,东望嵩岳,南有伊阙耸立,北有邙山屏障,地处四方之中。据《尚书·洛诰》记载:“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西周初年,周公于此营建王城,西周王城的位置在涧、瀍二水之间。西周王城至今尚未找到。考古发现的东周王城城址坐落在涧河入洛河处的三角地带,北垣长2890米,东垣残长1000米,平面近似正方形。城内南部保留有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可能与宫殿建筑有关。^[19]西周王城可能在东周王城区域之内,而且其形制可能近似。

综上所述,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我国早期城的形制,一般均为长方形或正方形。这种基本模式,约从龙山文化时期的小城堡开始,直到商周时代的王城,无不如此。乃至数千年之后的明清城,在规划上亦多呈方形。它同国外的所谓“圆村”或圆形城堡比较起来,是显然异趣的。

“方块田”规划概念方法与我国古代城制的关系

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是方形城。这种城制规划形成的原因,迄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但从古代“方块田”规划概念和方法上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根据确凿的历史考古资料,古代世界各地都曾经存在过方块形的土地规划制度。如埃及前王朝时期,即涅伽达文化Ⅱ期形成的斯帕特(SPT),中译为“州”,其象形字符为,表示由河渠划分的一些地段。^[20]古代罗马人划分方块田的情况,是先用悬规测出土地的中点,划分两正交“十”字形的大道,再纵横平行作无数小径,并规划成无数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田,每块土地的面积为罗马尺